



中国古典家具经典之作

林友华 连铁杞 著

仙作古典艺术家具

ZHONGGUO GUDIAN JIAJU JINGDIAN ZHIZUO
XIANZUO GUDIAN YISHU JIAJU

邵养泽题



主要参考书目

- 王世襄自选集·锦灰堆·壹卷·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 蔡易安·清代广式家具·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
- 胡德生主编·明清家具鉴藏·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施大光主编·中国古典家具价值汇考·辽宁：辽海出版社，2003年。
- 侯明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家具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
- 濮安国·明清苏式家具·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
- 濮安国·中国红木家具·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
- 胡德生·中国家具真伪识别·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
- 胡德生主编·古典家具收藏·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
- 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9年。
- 侯明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全·家具卷。
- 田家青·清代家具·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5年。
- 牛福忠·鉴宝·黑龙江：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年。
- 于伸主编·木样年华——中国古代家具·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 曹厉雪梅·紫檀情缘·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 冯骥才·民间灵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
- 白庚胜·民间文化保护前沿话语·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
- 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宁夏：宁夏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庞薰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
- 华德韩·东阳木雕·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
- 冯骥才主编·守望民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
- 冯骥才主编·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普查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 阮长江主编·中国历代家具图像大全·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 周默·木鉴·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 连铁杞，林友华·中国古典家具·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北京聚仙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馆地址



北京聚仙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馆外景（北侧正门）



北京聚仙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馆外景（东侧边门）



重要提示:

本书中所示实物及其图片均由北京聚仙堂文化艺术中心提供

书中所用图片的实物长期在北京聚仙堂文化艺术中心展馆展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路观音堂398号

电话: 010-87740120

中国古典家具经典之作

林友华 连铁杞 著

仙作古典艺术家具

ZHONGGUO GUDIAN JIAJU JINGDIAN ZHIZUO
XIANZUO GUDIAN YISHU JIAJU

邵兼泽题



傳統藝術

古典璀璨

連戰



敬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仙作古典艺术家具 / 林友华, 连铁杞著. — 北京 :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019-8734-4

I. ①仙… II. ①林… ②连… III. ①家具—鉴赏—
中国—古代 IV. ①TS666.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TP数据核字 (2012) 第054049号

责任编辑: 王秋墨

责任终审: 劳国强 封面设计: 刘临川

版式设计: 李培义 责任监印: 马金路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张: 18.25

字 数: 5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9-8734-4 定价: 298.00元

邮购电话: 010-65241695 传真: 65128352

发行电话: 010-85119835 85119793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

120234S8X101HBW

序 言



由林友华、连铁杞两位同志合著的《仙作古典艺术家具》一书在即将付梓之际，约我为本书写一序言。由于和两位作者从相识、相知到挚友已有十余年的时间，对他们继承、弘扬、推广并创新研究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经历、刻苦钻研艺术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态度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比较了解。我不但是熟知两位作者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对红木家具非常热爱、对我国红木家具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有所了解的人，曾先后十余次去福建仙游实地考察学习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制作过程，亲眼见证了仙游古典艺术家具生产规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粗到精的发展过程。人虽在红木古典艺术家具的门槛之外，从理论到实践也不是专门研究红木的专家，但自称是红木家具的高级发烧友一点也不为过。所以他们俩约我写序，看重的就是我对他们执着钻研艺术的精神和对古典艺术家具知识的了解，相信我写序言会实事求是，不会遭来华丽的词汇夸夸奇谈，不会无原则的吹捧，更不会说外行话罢了。盛情之邀难以推辞，就提笔写此拙文，完全站在读者的角度，就什么是仙作和两位作者十余年来为弘扬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真实情况做一介绍。

我国的古典艺术家具虽起源于北宋时期，但却盛行于明清时代。由于古典艺术家具从选材、制作、工艺、文化等方面非常考究，对材料的进口、运输、木工的技巧、雕刻师的工艺、设计师的文化理念等要求严格，必须符合天时、地利、人和、能工巧匠云集的基本条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意制造。所以从明清时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古典红木家具的制作地点主要集中在北京、苏州、广州和仙游。因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制作工艺不同，使红木家具的样式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但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为了明确区分和辨识这些家具，几百年来人们就习惯按照家具制作地分类，把在北京生产的称为“京作”、苏州生产的称为“苏作”、广州生产的称作“广作”、在仙游生产的就称“仙作”。于是乎，“京作”、“苏作”、“广作”、“仙作”家具自然形成了中国古典工艺家具的“四大流派”，各具特色，并驾齐驱，共同发展，四种称呼也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仙作”古典家具的历史悠久，有据可查，最初的仙作家具可追溯到北宋时期，是由时任北宋的宰相蔡京设计并组织仙游一带

的能工巧匠制作出来的，在中国古典家具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为以后古典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仙作家具是在吸取传统国画艺术、雕刻艺术的精华与家具制作技艺巧妙的融合，集款式典雅、结构严谨、用料考究、设计美观、雕工精细、擅长山水与人物、蕴涵文化理念、审美情趣为一体，实现了“形、材、艺、技、适、意、美”的和谐统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观赏性和收藏性。

正是由于仙作家具历史悠久、特点突出、使用范围广泛、知名度高，在中国古典家具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所以，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本着纵观历史、横比当今、慎重考虑、全面衡量的精神，最终把“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的盛名品牌授予仙游县。

由于“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的盛名落户仙游，为“仙作”古老的金子招牌重新涂上了一层具有时代特征的金粉，使其更加闪烁着道道金色的光芒。近几年来，作为在仙游从事古典工艺家具的企业家都非常重视和珍惜这一荣誉，都在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振兴和发展古典工艺家具，“仙作”家具的品牌也随之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所认识，“仙作”家具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众多的销售网点，为弘扬发展中国古典工艺家具起到了领头羊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传统古典工艺家具的四大流派中，“仙作”古典工艺家具已经借着强劲的东风，扬帆起航，在古典工艺家具行业的大海中，驶向深蓝。

每一个在仙游从事古典工艺家具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有良知、有敬业精神、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和文化人，都立足本地，在继承、弘扬祖先文化的前提下，思考着一个严肃而深远的问题：“如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光大”。本书的作者林友华和连铁杞两位同志就是仙游众多企业家和文化人中思考最多、干劲最大、既重视理论总结、又注重实践创新的佼佼者和带头人。本书的出版就是他们为总结弘扬仙作文化、推广仙作理念、树立仙作诚信、创新仙作家具标准做出的具体行动。

林友华，地道的仙游人，出生在仙游县游洋镇一个群山环抱、林竹茂密的龙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由于家境贫寒，早年辍学，在家从事竹雕、竹编、木雕、牙雕手工艺，由于聪颖灵敏、勤奋吃苦、不耻下问、虚心好学，从小练就了一手雕刻的好手艺。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就走出山村，依靠自己一手雕刻技艺和诚信态度云游全国各地，销售与竹雕、木雕有关的工艺品，以此维持生计。2000年前后，当以紫檀、黄花梨为代表的红木家具沉寂了百余年后，重新在曾经是明清两代帝王生活近600年、曾经是红木家具最为集中最为发达的京城开始慢慢复苏。在逐步浮出市场之际，他凭借在京城市场多年奔波的经验，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预计到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家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传统文化不断的弘扬和光大，有着几百年历史传统的红木家具将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成为文人雅士、有识之士青睐的高档实用家具。于是，他一方面在京城租门面、建工厂、搞销售，同时回家乡大力传播发展红木家具的理念。当时在仙游从事红木家具的公司仅仅十余家，从业人员不过百十人，他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达成共识的生产理念，继承仙作家具的优良传统，弘扬仙作家具的文化理念，在吸取祖先精华中，与时俱进，根据当代人的需要，创新发展新的家具。同时制定营销方案，把诚信、质量、服务放在首要位置，立志和大家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把仙作家具的品牌推向市场。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林友华在京城经营的“北京聚仙堂文化艺术中心”规模越做越大，艺术中心的大堂内聚满了仙作家具的顶级产品，为仙作家具在皇城内开设了一个规模最大、精品最多、诚信最好、影响广泛的宣传展示窗口。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众多文化知名人士、专家、学者、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断光临中心，通过这个窗口不断把仙作家具的历史和文化，继而把仙游这个地名传播到全国各地，使仙作家具和仙游的名声越来越大。众多的消费者知道了什么是仙作家具，仙游在哪里。于是乎，广大的消费群体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仙游县城，采购仙作家具。为了满足市场需要，仙作家具的制作公司飞速发展，十年间，由二十多个公司已经发展到目前的3600多个公司，产值由十年前不到1亿元发展到现在的二百多亿元。使仙作家具成为当地政府的支柱产业，也成为当地人员就业的主体行业。林友华先生在继承、弘扬、宣传、推广仙作家具中为仙游县的人民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卓越贡献。

连铁杞，也是地道的仙游人。任县文联主席多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仙游县工作了几十年。仙游县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文人名人辈出。在这样的文化大县能当上文联主席，如果在文化上没有两把刷子，没有真才实学，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对家乡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详细了解肯定难以胜任。所以说，连主席在仙游县是一个文化名人，上至中央、省、地各级新闻媒体，下至各局、委、办、村、镇，凡是想了解仙游文化历史的人，都离不开他的介绍和参与。前边已述，仙作家具也是仙游县灿烂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更离不开他的

积极参与和倡导。为了以文化兴县，他积极挖掘、弘扬、研究、推广仙作文化。为了振兴县域经济，他率先提出了以仙作文化创意产业为龙头的口号，同时为提高仙作家具的质量，维护仙作家具的品牌，他以县文联的名义组织仙游民间艺术家协会，成立了仙游工艺美术研究院、仙游古典工艺家具研究院，还与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办雕刻培训班等，用实际行动为继承、弘扬、传承仙作家具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林友华，仙作家具的实干家、带头人；连铁杞，仙作家具文化的挖掘者、推广者；他们俩一文一武，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文化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和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十年来，一个奔波于京城和仙游两地，为在全国的范围内推广、宣传、销售、制作仙作红木古典艺术家具付出了艰辛的汗水；一个坚守仙游文联阵地的制高点，为不断挖掘、丰富、弘扬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历史文化默默耕耘。他们不断交流、研究各自学习的成果和文化理念，不断创新，不断实践，推陈出新，一件件融合了历史与现实文化的仙作艺术家具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由想象变成了现实，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丰富了仙作家具的内涵和样式。为新时期、新阶段，仙作家具如何继承和创新探索了一条新路，为有着千年历史的仙作古典工艺家具增添了新的内容。

本书图文并茂，约6万字的文稿，既有对我国古典工艺家具历史的研究，更有对仙作家具理念的认识、传承、创新和发展。200余幅古典工艺家具和工艺品的图片，都是他们共同探讨、研究、创新而制作的实物。图片和文字都是他们为继承、弘扬、发展仙作古典工艺家具做出的具体贡献。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空白，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家具图片。读文字可以悟其意，观图片可以照其做，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是值得研读和推荐的一本好书。相信此书一定会成为传承仙作家具的得力之作，更相信仙作家具的金子招牌经过大家不断的增光添彩会越来越金光熠熠，折射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在此，祝贺两位作者的图书早日与读者见面，感谢两位作者为弘扬仙作古典艺术家具做出的巨大贡献，学习两位作者为了艺术不断创新、钻研的敬业精神。

李培義

(序言作者系《解放军画报》长城出版社原社长)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典家具的历史.....	9
一、中国古典家具的历史.....	9
1、汉代以前的家具	9
2、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时期的家具	11
3、明代家具和清代家具	13
二、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	16
1、明清家具的品种鉴定	16
2、家具款识鉴别	16
3、明清家具的年代鉴定	16
4、古家具作伪手法	17
5、明清家具的鉴定方法	19
6、明清家具的价值	19
7、明清家具的评价标准	20
8、古典家具的使用和保养	21
9、古典家具与现代家居环境	21
第二章 仙作古典工艺家具.....	23
一、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精湛结构.....	23
1、龙凤榫加穿带	23
2、攒边打槽装板	24
3、楔钉榫	24
4、抱肩榫	24
5、霸王枳	24
6、夹头榫	24
7、插肩榫	24
8、走马销	24
二、仙作古典工艺家具品种类别.....	25
1、椅凳类	25
2、桌案类	26
3、床榻类	27
4、柜架类	27
5、其他类	28

三、 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名贵材料·····	29
四、 仙作古典工艺家具风格延续·····	30
1、典雅的文人氣息 ·····	30
2、质朴的乡土风味 ·····	31
3、装饰风格的时代性 ·····	32
 第三章 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保护·····	 33
一、仙作古典工艺家具保护的建議·····	33
二、仙作古典工艺家具保护的目標·····	34
1、世界保护 ·····	34
2、国家保护 ·····	34
3、民间保护 ·····	34
4、教育保护 ·····	34
5、产业保护 ·····	35
6、学术保护 ·····	35
三、仙作古典工艺家具保护的項目·····	35
1、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图案 ·····	35
2、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刀具 ·····	38
3、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雕技 ·····	39
4、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榫卯 ·····	40
5、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漆作 ·····	41
6、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的镶嵌 ·····	41
 仙作古典工艺家具图谱·····	 43
仙作椅凳类·····	43
仙作桌案类·····	87
仙作柜架类·····	147
仙作床榻类·····	175
仙作杂项类·····	203
仙作摆件类·····	237

第一章 中国古典家具的历史



中国古典家具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无论是笨拙的商周家具、随意的矮型家具(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舒展的渐高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用的高低家具(隋唐五代时期)、简洁的高型家具(宋元时期)，还是古雅而精美的明式家具、雍容华贵的清式家具，都以其富有美感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中外人士。中国古典家具，尤其是被誉为中国古典家具奇葩的明清家具，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家具的发展。

中国古典家具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之前“家具的初始阶段”，二是从春秋战国到唐代之间的“早期古典家具阶段”，三是从五代到清朝之间的“晚期古典家具阶段”。现分述如下：

一、中国古典家具的历史

1、汉代以前的家具

席是古代最原始的家具

中国古代，人们“席地而坐”，最早、最原始的家具便是坐卧铺垫用的席。席的产生，约在神农氏时代。考古界发掘出土的最早实物有新石器时代的蒲席、竹席和篾席等，距今已有五千多年。以后，从夏、商、周直到两汉时期，我们的古人在居室生活中始终没有离开过席，席便成了这时期最主要的家具。

首先，古人将“席”与“筵”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重席”制度。一方面，用它来防潮湿，避寒冷，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习俗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的以设席的方式来表现各种规制和礼节。故《周礼》中有所谓“王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的记载。

那时，古人不论是生活起居，还是接待宾客，都在室内布席。不过“席不正不坐”，于是就有所谓“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等各种各样的规矩和习惯，如在《礼记》中有“席，南向北向，以西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等

规定。在古籍中，我们常能看到不少“连席”或“割席”的生动故事，因身份或志趣的不同，坐席也有明显区别。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家具从开始就蕴含着极其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

当时使用的筵和席有很多种类，从选用材料到编织工艺都十分讲究。《周礼·春官》中记载的“莞、藻、次、蒲、熊”，就是运用不同材质分别制成不同花纹和色彩的五个品种，它们都以各自的特色，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尚书·顾命》里所提到的“丰席”和“筭席”，均是经过特别选料、精致加工的优质竹席。

总之，席这种最古老的家具，不仅是中国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用品，而且是古代习俗和礼仪规制的直接体现，是我们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具有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传统。

史前彩绘木家具的重要发现

1978~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单位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发掘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木制家具，为中国史前家具展现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这些家具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木几、木案和木俎。木几平面均为圆形，圆周起棱边，下置束腰喇叭状的独足，几面直径多在80厘米以上，通高30厘米左右。木案的“形状很像一个长方形的小桌”，平面通常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在一长边与两短边间构成方形板足，有的在另一长边中还加置圆柱形足，案长90~120厘米、宽25~40厘米、高10~18厘米不等。木俎大多为四足，用榫与俎面的榫眼相接，长方形俎面较厚，长50~75厘米，宽30~40厘米，俎高12~25厘米。

这些木制家具，大多在器身表面施加彩绘，有的单色红彩，有的以红彩为底再绘彩色花纹。由于埋藏在地下四千多年，木胎已经完全腐朽，经考古工作者采用科学方法起取出土、复原后，真实地再现了古代早期家具的初始形态，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家具实物填补了空白。

典雅凝重的青铜家具

商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高度发达的时期，古代家具通过青铜器的形式，为我们留下了这历史阶段中最珍贵的实物资料。被鉴定为殷商器的青铜饕餮蟬纹俎，就是一件

较早的传世青铜家具。该俎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西周时期的四直足十字俎和商代壶门附铃俎，也都是极其珍贵的青铜家具实物。

1976年在殷墟王室墓出土的青铜三联座，高44.5厘米，长107厘米，重113千克，六足，四角饰牛头纹，四外壁饰有相互间隔的大涡纹和夔纹。座架面上有三个高出的圈，可同时放置三只器皿，故名三联座。它不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大型青铜器，更是一件典型的早期青铜家具。这件青铜座的出土，进一步为我们展示了商周时期中国古代家具独特的形式和极高的艺术水平。

与此类似的是放置各种酒器的青铜禁，实物有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初年的青铜夔纹禁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西周青铜禁。后者当年在陕西凤翔出土时，禁面上仍摆放着卣、觚、爵等十三件酒器。这两件青铜禁，都是不可多得的商周青铜家具。

据古籍记载：禁，可分为无足禁和有足禁。上述两件均是无足禁。1979年，河南淅川县楚令尹子庚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有足铜禁。铜禁长107厘米，宽47厘米，长方体，禁面中心光素无纹，边沿及侧面都饰透雕蟠螭纹，下面有十只圆雕的虎形足，禁身四周铸有向上攀附的十二条蟠龙。卓越的铸造工艺，使青铜家具的造型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1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国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银龙凤铜方案，更是件罕见的古代家具瑰宝。此案“设计造型之奇巧，制作技术之高超，装饰工艺之精湛”，出土以来，一直受到文物界、工艺美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古代物质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

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家具，总与同时代居室生活中各类器物保持一致。青铜家具也和其他青铜器一样，不仅是青铜时代灿烂文化的标志，而且代表着中国古代家具的重要历史阶段。每当人们从后世的古典家具中看到与青铜器物造型的渊源关系时，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物质文明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地位。

五彩缤纷的先秦漆木家具

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过程，一直是漆木家具为主流，从史前的彩绘木家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漆木家具，反映着中国古代前期家具的主要历程。

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昌盛文明的时期，社会的繁荣对物质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加上高度发达的髹漆工艺，为漆木家具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特别在楚国，漆木家具广泛应用，迅速使家具品类增多，质量提高。漆俎在战国楚墓中一次出土就多达几十件，说明该品种自商周以来已达到成熟的阶段。1988年6月，湖北当阳赵巷四号墓出土的一件漆俎，除俎面髹红漆外，其他均以黑漆做地，用红漆描绘十二组二十二只瑞兽和八只珍禽。禽兽在外形轮廓线内采用珠点纹装饰。该俎造型生动别致，画面图像形神兼备。瑞兽似鹿，俎纹取“瑞鹿”为题材，应是楚人崇鹿时尚的体现。《礼记·燕义》还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的记载，说明这件精美而富有意味的漆绘家具，是当时社会宴礼待宾、祭祀尊祖、讲究器用的真实反映。

河南信阳一号楚墓出土一件黑漆朱色卷云纹俎，其两端各有三足，足下置横枅，长99厘米，宽47.2厘米，高23厘米，规格比一般漆俎大得多。这件大型的漆俎，考古界有人认为就是房俎，可能是当时俎的一种新形式，已与漆案渐渐接近。这也许就是以后俎很快被几、案替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先秦时代的漆禁与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禁已经有较大的差异，如信阳出土的漆禁，其禁面浮雕凹下两个方框，框内有两个稍凸出的圆圈圈口。出土时，在禁的附近发现有高足彩绘方盒，其假圈足与此圆圈可以重合。这说明，禁的使用功能不断扩大，造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无论是在实用性还是在装饰性上，先秦时期最富有时代性和代表性的家具是漆案和漆几。《考工记·玉人》载“案十有二寸，枣栗十有二例。”可见春秋战国时，案的品种分门别类，已日趋多样化，并且多与“玉饰”有关，是一种比较新式的贵重家具，因此大多造型新颖，纹饰精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漆案和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金银彩绘漆案，皆是这类漆木家具中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几，有造型较为单纯的“H”形几。这种几仅采用三块木板合成，两侧立板构成几足，中设平板横置，或榫合，或槽接，既有强烈的形式感，又有良好的功能效果。较多见的是几面设在上部，两端装置几足的各种漆几。根据几面的宽、狭，又可分为单足分叉式和立柱横附式两种类型。立柱横附式的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制。在长沙刘城桥一号楚墓出土的漆几，几的两端分立四根柱为几足，承托几面，直柱下插入方形横木甲，同时另设两根斜挡，从横附面斜向插入几面腹下，使几足更加牢固，形体更加稳健。这些先秦时期漆几的造型和结构，都足具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取得的巨大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的漆木家具还有雕刻、彩绘精美的大木床，工艺构造精巧、合理的框架拼合折叠床，双面雕绘、玲珑剔透、五彩斑斓的装饰性屏席，以及各种不同实用功能的彩绘漆木箱等。它们无一不是春秋战国时期漆木家具的优秀实例，是中国席坐时代居室文明的重要标志。

适应“席坐”和“坐榻”生活的汉代家具

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汉代以后,出现了一个长盛久安的新局面,尤其在汉武帝时,无比强大的国力和思想领域的一统化,迅速加快了战国以来社会民风习俗的大聚会。从此,中国成为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代的物质文化在历史的基础上又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汉代统治阶层居住在“坛宇显敞,高门纳驷”的宅第中,过着歌舞娱乐、百戏宴饮的享乐生活,与生活内容相适应的汉代家具也更加讲究起来。刘歆在《西京杂记》中,就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侧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的描绘。

在江苏邳江县胡场汉墓中发现一幅木版彩画,画幅上部绘有四人,墓主人端坐一榻之上,衣施金粉,体态高大,其余三人都面向左呈拱手作揖或跪立状。画幅下部绘帷幕,其下有人坐在榻上,前置几案,案上有杯盘,几下放香熏,侍女跪立榻后;伶人彩衣轻飘,一倒立,一反弓,姿态优美生动;成双成对的宾客皆席坐在地,聚精会神地观赏表演。右边是击钟敲磬、吹笙弹瑟的乐队在进行伴奏。像这幅反映墓主人生前欢乐生活的绘画作品,无疑也是汉代现实生活形象记录,再现了当时居室生活与家具的真实情况。汉代时期,在“席地而坐”的同时,开始形成一种坐榻的新习惯,与“席坐”和“坐榻”相适应的汉代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由商周时期的筐床演变而成的榻,到汉代已是日益普及化的一种家具,故“榻”这个名称迟至汉代才出现。1958年,河南郸城出土一件西汉石榻,青色石灰岩质,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榻足截面和正面都为矩尺形,榻面抛出腿足,造型新颖,形体简练。在榻面上刻有“汉故博士常山太傅天君坐木 翁(榻)”隶书一行,共十二个字。这不仅是一件罕见的西汉坐榻实物,而且更有迄今所见最早的“榻”字。汉榻一般较小,有仅容一人使用且可“去则悬之”、实用而方便的“独榻”。简单的小榻还称“枰”。根据使用要求和场合的不同,东汉以后,更多的是供两人对坐的“台榻”,还有三人、五人合坐的“连榻”。

席坐文化时期,居室内常常采用帷幕、围帐御风寒,作遮挡。到汉代,随着床榻的广泛运用,这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各种形式的屏风所替代。屏风既能做到布置灵活,设施方便,又能改变室内装饰效果,美化环境,因此,汉代的屏风成了汉代家具中最有特色的品种。统治者们都竭力追求屏风的豪华,如《太平广记·奢侈》所记,西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挥霍无度,所用之物极其铺张。有一次,她从臣下处得贡品三十五种,其中就有价值连城的“云母屏风”、“琉璃屏风”等。这些讲究材质和工艺的高级屏风,已成为当时一种珍贵的艺术品,在《盐铁论》中就有所谓“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描述。汉代屏风的最早实物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彩绘木屏。该屏风长72厘米,宽58厘米,屏风正面为黑漆地,红、绿、灰三色油彩绘云纹和龙纹,边缘用朱色

绘菱形图案。背面红漆地,以浅绿色油彩在中心部位绘一谷纹壁,周围绘几何方连纹,边缘黑漆地,朱色绘菱形图案。屏风系座屏式,虽是一件殉葬品,但真实地展现了西汉初期屏风的基本风貌。

汉代屏风多设在床榻的周围或附近,也有置于床榻之上的,形式除座屏以外,更多的是折叠屏风,有两扇、三扇或四扇折的,金属连接件十分精致。各种屏风与后世的式样并无多大差异。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屏风是流传最久远,最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品种之一。

与汉榻配置密切的家具除屏风以外还有几和案。汉几多见置于榻上或榻前,以曲栅式的漆几最普遍。各种凭几大多制作精良,富有线条感。《释名·释床帐》云:“几,度也,所以度物也。”“度”即“藏”,故知汉几的功能不断得到扩大,有时还可以用它来放置东西,甚至供人垂足而坐。另外,在朝鲜古乐浪和河北满城一号西汉墓中出土的漆凭几,门、足可作折叠,可高可低,根据需要可加以调节,其设计之巧妙,构造之科学,对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汉代家具中常见的案,在规格、形制和装饰方法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除漆案以外,还有陶制和铜制的,品种有食案、书案、奏案等各种类别,从各方面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至于汉代是否有桌,至今在认识上仍存在着分歧,但从一些画像砖和壁画等图像中,已经看到一些功能和形式都近似桌的家具。

综上所述,居室生活处在“席坐”向“坐榻”过渡时期的汉代,家具的品类和形式不断增多,功能也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这一时期的家具,虽然依旧形体低矮,结构简单,部件构造也较单一,在整体上仍保持着古代前期家具的主要风格 and 特点,但家具立面的形式变化较丰富,榫卯制造渐趋合理,这些,都为增进家具形体高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代家具在继承先秦漆饰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彩绘和铜饰工艺等手法日新月异,家具色彩富丽,花纹图案富有流动感,气势恢宏,这些装饰,使得汉代家具的时代精神格外鲜明强烈。

2、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时期的家具

变革鼎新的魏晋南北朝家具

魏晋南北朝长期的社会动乱和国家的四分五裂,导

致了中国古代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变化。首先,汉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与外来异族文明在相互交流中得到进一步的融会和升华,产生了一次新的突破。同时,思想领域内儒、道、佛的互相影响和吸收,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基因,使传统意识中的跪坐礼节观念很快淡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民风习俗得到了自由发展的契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一个较开放的历史阶段。

这时,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家具,既有继承传统的品种和式样,又有来自天竺佛国的形式,还有西域胡人传入的家具,从而使魏晋南北朝的家具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局面。

在敦煌石窟285窟西魏时期的壁画中,有一幅山林仙人画像。仙人身披袈裟,神情怡然安详,姿态端正地盘坐在一把两旁有扶手、后有靠背的椅子上。这是中国古代家具史上迄今最早的椅子形象资料。它与秦汉时期的坐具明显不同,腿后上部设有搭脑,扶手的构造与后世椅子极其相像。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的新颖坐具有四足方凳、箱体形的凳子,细腰形圆凳和坐墩等。受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的影响,胡床、绳床等家具也广为流行。以上这些家具,几乎皆是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

依据魏晋南北朝出现椅子和胡床的现象,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古代家具在吸收外来营养中,得到了一次新的发展和提高。此后,中国家具的古老传统渐渐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出现许多新的面貌。在世界坐具发展史上,中国古代的凳子、椅子比埃及和希腊等国家晚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坐具的发展无疑会受到世界各国家具的影响,但任何民族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民族自身的内部因素。从先秦到两汉,随着居室生活的演进,中国古代的家具不断选择自己需要的形式。如最具有传统特色的屏风与坐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坐身上部的围屏已完全失去了秦汉时屏风与榻组合作用的意义;虽然坐身仍然形体低矮,但围屏高度的比例已显著下降。这种仍称为“围榻”的坐具,与后来制造的椅子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传统古典式的坐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至于胡床之类的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外来的式样,作为我们民族居室生活中的一种补充和点缀,它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家具的悠久传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制造在选材上日趋多样化,

除漆木家具以外,竹制家具和藤编家具等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审美情趣。总之,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族的物质文化也日新月异,中国古代家具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营养的过程中,又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实现了新的历史价值。

文化内涵深邃的隋唐家具

隋朝前后三十七年,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代,家具大多沿袭前代的形式。1976年2月,山东嘉祥县莫山脚下发现一座隋开皇四年(584年)的壁画墓,在墓室北壁绘有幅《徐侍郎夫妇宴享乐图》。图中设山水屏风的漆木榻上,有足为直栅形的几案,以及供女主人身后背靠的腰鼓形隐囊等,与南北朝的家具一脉相承。

繁荣强盛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高度发展的时期,在手工业和社会文化都很发达的大氛围中,时代精神蒸蒸日上,诗、文、书、画、乐、舞等,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黄金时代。充满琴棋书画、歌舞升平的文化生活环境,也赋予唐代家具丰富的内涵。家具除了随着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各种椅子和高桌以外,在装饰工艺上兴起了追求高贵和华丽的风气。

具有时代特征的唐代月牙凳和各种铺设锦垫的坐具,不仅漆饰艳丽,花纹精美,而且装饰金属环、流苏、排须等小挂件,格外显得五光十色,光彩夺目。瑰丽多彩的大漆案以及各种具有强烈漆饰意味的家具,与当时富丽堂皇的室内环境起到了珠联璧合、和谐得体的艺术效果。这种家具的装饰化倾向,在各类高级屏风上更显得无与伦比,受到当时诗人们的歌咏和赞叹。“屏开金孔雀”,“金鹅屏风蜀山梦”,“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瓏”,以及“珠箔银屏迤迤开”等生动的描绘,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幅金碧辉煌、珠光宝气的屏风景象。这些屏风象征着当时人们的审美理想,说明人们在追求金、银、云母、宝石等天然物质美的同时,还格外热衷于精神文化在家具中的体现。因此,唐代出现了许多高级的绢画屏风,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绢画屏,八扇一堂,绘画精致,色彩富丽堂皇。在唐代壁画墓中,还能见到仕女画屏风、山水屏风等,都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据文献记载,这种画屏价值很高,当时“吴道玄屏风片,值金二万,次者值一万五千;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如此昂贵的画屏价格,足以证明唐代家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唐代是高形椅桌的起始时代,椅子和凳子开始成为人们垂足而坐的主要坐具。唐代的椅子除扶手椅、圈椅、宝座以外,又有不同材质的竹椅、漆木椅、树根椅、锦椅等。众多的品种、用材、工艺,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唐代高形的案桌,在敦煌85窟《屠房图》、唐卢楞伽《六尊者像》中也有具体的形象资料,如粗木方案、有束腰的供桌和书桌等。另外,唐代还出现了花几、脚凳、长凳等新的品种。当然,唐代在一定程度上还未完全离开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生活方式,适应垂足而坐的高形家具仍属初制阶段,不仅品类的发展不平衡,而且形体构造上也依旧处于过渡状态。

新颖的五代家具

五代的家具,根据《韩熙载夜宴图》所绘的凳、椅、桌、几、榻、床、屏、座等看,已十分完善,但最近余辉先生在《收藏家》第5期撰文论述中认为,该画系南宋作品。尤其涉及家具器用时,说“椅子和几、屏、榻的样式在南宋赵伯驹(传)《汉宫图》……图册中,都可发现大致一体的样式”。画中的这些家具,究竟属五代还是南宋作品,确实很值得考证一番,这不仅为《韩熙载夜宴图》的创作年代提供论据,而且对中国古代家具的断代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不过,我们从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卷》和王齐翰的《勘书图》中,都可以对五代时期的屏风、琴桌、扶手椅、木榻等家具的造型和特征获得深入的了解。当时,四足立柱式样与传统壶门构造的家具结构已经同时发挥出它们的造型作用,并在结构的转换中逐渐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1975年4月江苏邳江蔡庄五代墓出土的木榻等家具实物,为我们提供了五代家具结构真实而具体的范例。木榻长180厘米,宽94厘米,高57厘米。榻面采用长边短45°格角接合,但没有格角榫出现,仅采用钉铁钉的做法构成框架。两长边中间排有七根托挡。托挡上平铺九根长约180厘米、宽3厘米、1.5厘米的木条,也用铁钉钉在托挡上。托挡与长边连接时,皆用暗半肩榫。木榻四腿以一平扁透榫与大边相接,并用楔钉榫加固。腿料扁方,中间起一凹线,从上至脚头的两侧设计两组对称式的如意头云纹,富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两侧腿足间设有宽4.2厘米、厚2.6厘米的横档根。腿足与两大边相交处设有云纹角牙一对,也是采用铁钉钉在大边上,只是与脚部相接处采用了斜边。同时出土的还有六足木几等家具。

这件木榻与五代绘画中的家具画像有着相同的时代特征,是五代家具难得的实物资料,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具有明确断代的价值。其中如意头云纹作装饰的扁腿,是富有鲜明传统特点的民族式样之一,它自隋唐一直延续到宋元,前后经历近千年的历史。明清家具中的如意云纹角牙,也都出于这一渊源。

适应“垂足而坐”的宋式家具

唐五代以后,宋代的经济与文化继往开来,使中国物质和精神的优秀传统得到了一次发扬。封建时代文明的丰硕成果,在两宋时代取得了更大的收获,增添了许多新的韵味。在传统的手工业部门,纺织和陶瓷都以最卓越的成就超过历史水平,中国古老的传统家具也焕发出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表现出新的生命力。

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长时间过渡,结束了“席坐”和“坐榻”的生活习惯,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在茶肆、酒楼、店铺等各种活动场所人们都已普遍地采用桌子、椅凳、长案、高几、衣架、橱柜等高形家具,以满足垂足而坐的生活需要。如在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一号墓西南壁的壁画中,宋代绘画《半闲秋兴图》中,都已把妇女们梳妆使用的镜台放

到了桌子上。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对这种情景作了记载。

宋代家具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从传统中脱颖而出:一是构造上仿效中国古代建筑梁柱木架的构造方法,形体明显“侧脚”、“收分”,加强了家具形体向高度发展的强度和坚固性,并已综合采用各种榫卯接合来组成实体;二是在以漆饰工艺为基础的漆木家具中,开始重视木质材料的造型功能,出现了硬木家具制造工艺;三是椅桌成组的配置与日常生活、起居方式相适应,使家具更多表现出家具的个性特征。宋代家具已为中国传统家具黄金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延续发展的元代家具

在元朝统治的89年间,中国古代家具依旧沿着两宋时期的轨迹,继续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家具的品种有床、榻、扶手椅、圈椅、交椅、屏风、方桌、长桌、供桌、案、圆凳、巾架、盆架。较有代表性的是元朝刘贯道绘《消夏图卷》中的木榻、屏风、高桌、榻几和盆架等,与宋代家具一脉相承。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中的方桌,在保持宋代基本做法的同时,桌面相接处牙板膨出,体现了一种新的形体特征。山西文水北峪口古墓壁画中的抽屉桌,在注重功能的同时又对构造作了新的改进。腿足膨出在山西大同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供桌以及大同东郊元代李氏崔莹墓出土的陶长桌上都很明显。这种被考古界称为“罗汉腿”的腿式,不仅是带有地方风格的形式,也是宋代以来普遍流行的一种新的造型式样。

在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元代山西永乐宫壁画以及以上一些元墓出土的木器中,家具的弯脚造法和花牙的部件结构更趋向成熟,如膨牙弯腿撇足坐凳,已达到极其完美的程度。

元代家具的木工工艺继两宋以后又取得新的变化。不管是部件结构的组成方式,还是装饰件的设计安排,都遵循木工制作高度科学性的要求,以合理的形式构造表达了人们对居室家具的审美观念。

3、明代家具和清代家具

明代家具的历史条件

宋元以后,中国社会仍然延续着千年以来的封建统治

制度。明朝结束元代异族政权之后,经过几十年的恢复,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至明代中叶,举国上下出现了空前繁华的景象,特别是活跃工商业集镇,促使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产生出许多新的活力。手工业的高速发展,文化艺术的复兴和昌盛,使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在这种前提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各个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明代的家具,也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时,各地区家具业的生产都非常兴旺发达。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被称为六大古都之一的南京,木器行业大多集中在市内应天府街之南的纱库街,应天府街之北又有木匠营,生产和经营盛况空前。明代河南的省城开封,在五胜角大街的路西,“俱是做妆奁、床帐、桌椅、木器等物”的店铺;在城隍庙的东南角门外,也全是卖桌椅、床、凳、衣盆、木箱、衣箱、头面小箱、壁柜、书橱等木器的市场。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的要求到顾客家中加工制造。

明墓出土的珍贵家具资料

从考古出土明代嘉靖(1522-1566)年间和万历(1573-1620)年间的陶制、石制、木制模型来看,仅家具的品类就有方桌、长方桌、供桌,有天然几、香几,有靠背椅、交椅、圈椅、扶手椅、宝座、凳子,有衣架、脸盆架、巾架、火盆架,有屏风、踏凳、箱、柜、橱,有架子床、踏步床,品种不少于数十种。其中以上海卢湾潘允徵墓出土的木家具和苏州虎丘王锡爵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木家具模型最典型。前者是明万历十七年(1589),后者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后者出土时,家具模型原封不动地安放在棺槨上,未经扰乱。这许许多多不同品种和形式的家具模型,无疑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家具以及居室内部陈置的缩影,它们都对研究明代中叶的家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代的漆饰家具

按不同的用材和工艺,明代家具可分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山柳等制作的民间

家具,还有用陶、瓷、石料等制作的家具。明代的漆饰家具和各类五光十色的漆器,正如漆艺名家杨明在《髹饰录》一书的序文中概括和评述的:“今之工法,以唐为古格,以宋元为通法,又出国朝厂工之始,制者殊多,是为新式,于此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矣。”如剔红,即红雕漆,自宋元以来,以此做法用于家具,可能属明代最早。现在我们所知道刻有确切清中期·紫檀面脚踏年代铭款的,除上述宣德的剔红供桌外,还有剔红文椅和榻凳,只可惜很早就流落到国外。国内最早的有宣德时期的戗金细钩漆龙纹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种被称为雕填的工艺,比单纯填漆的漆家具更加华丽。明万历时的漆饰家具具有黑漆甸沙地描金龙纹架格、黑漆描金药柜、黑漆嵌螺钿彩绘描金云龙纹平头案等传世实物,以上均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物。另外,还有未作刻铭落款的各种漆家具,如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楠木透雕漆宝座,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剔犀卷云纹炕几,南京博物院的园林仕女图螺钿黑漆屏风,安徽博物馆的楼阁园林款彩黑漆屏风,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黑漆嵌螺钿罗汉床、戗金细钩填漆春凳等。这些有款或无款的明代漆家具,不仅在描金、螺钿、镶嵌、款彩等髹饰工艺和表现手法上,奇巧精妙的程度令人称绝,而且家具造型之古朴,色调之高雅,纹样之得体,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代的漆饰家具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漆木家具发展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这些漆饰家具在明代家具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人编的《天水冰山录》是公元1565年严嵩之子严世蕃获罪后的本抄家账,其中记载有大理石及金漆等屏风三百八十九件,大理石、螺钿等各种床六百五十七张,七千四百四十四件桌椅,橱柜、凳、杌、几架、脚凳等家具中绝大多数也是漆饰家具。另外,从明何士晋编辑的《工部厂库须知》卷九所载万历十二年(1584)宫中制造极其精致的各种漆饰龙床等四十件的工料费用,耗资就高达白银三万二千六百两之巨。就是在广大城市乡村民间,同样也以形形色色的漆饰家具为主流。

由于历史的原因,明代漆饰家具实物流传至今的仍属少数,有待人们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明代优秀的硬木家具

明代中叶以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除漆饰家具外,还出现了以黄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料的硬木家具,包括楠木、榿木、榆树等制作的家具,并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又一高峰。这种家具特别受到大家的青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人氣息和艺术风格,为中国传统家具建立了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这种高级硬木家具,也就是至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赞赏的明式家具。这类家具一直延续到清代早期,它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黄金时代。

明代的竹制家具

明代的竹家具很少被人们注意。加上竹制品的牢固性不强,更多的只是在